

隐喻的语境分析

郭贵春 安军

内容提要 隐喻研究是当代哲学运动中的语言学、解释学、修辞学“三大转向”的一个重要的汇合点。本文在考察了隐喻研究的当代背景特征后,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指出并说明了在特定语境中语形是隐喻的载体,语义是其本质,语用是其生成方式,从而给出了一个较为细致全面的隐喻的语境分析,并指出了一种朝向语境的隐喻研究走势。

关键词 隐喻 语境 语形 语义 语用

在当代,隐喻从多个向度和层面进入哲学研究的视域之内。除在诗学、修辞学、美学中发挥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外,隐喻也频频出现在心智哲学(如一般精神概念的隐喻形态问题)、科学哲学(如隐喻与解释模型之比较)、认识论(如类比推理)以及认知研究(如概念的形成理论)之中。但是无可否认,隐喻首先是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而存在的。因此,对之作出一种细致的语言哲学分析,是澄清隐喻在上述这些领域的存在、本质及意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英文词“metaphor”(隐喻)源于希腊词“metapherein”,“meta”的意思是“超越”(beyond),“pherein”则有“提供”、“带来”(to bring)等含义。《牛津哲学词典》认为,隐喻是最重要的一种修辞格式,其中有关话题(意旨)被一种用于非字面意义描述的语词或句子来指称;在一种典型的隐喻用法中,“相关特征的结合成为不合逻辑和荒谬的,但是理解并不因此而失效”。伴随着当代哲学运动中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的“三大转向”,特别是在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中,隐喻得到了愈来愈密集和热切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隐喻研究蔚为显学:一

种以隐喻研究为核心并广泛扩展渗透至多学科领域的“隐喻学”(metaphorology)逐渐成形,学术界甚至掀起了一股“隐喻热”(metaphormania)，“隐喻转向”(the metaphorical turn)的提法也随之出现。这些现象和动态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客观论之,隐喻无论在哲学中还是在科学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隐喻研究的当代“语境”

传统隐喻研究在当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之称为一种转折或转向。因之,当代的隐喻研究体现出了全新的时代特色。或者说,当代隐喻研究是在一种全新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在本体论上,隐喻的地位被大大地提高,人们已经从一种语言修辞现象上升到认知和思维的一种内在的、本质性的结构层面上来重新发现和认识隐喻;在认识论上,隐喻不再被看作仅仅具有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功能,它所特有的科学认知功能也逐渐被揭示出来;在方法论上,隐喻研究被置于更广阔的研究视域内,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广泛采用。至此,人类理智前所未有地清晰

洞察到了隐喻这一特殊现象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总之,隐喻研究的当代“语境”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隐喻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语言修辞现象,而且被认为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是由其文化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通过隐喻原则所展现出来的浅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换言之,隐喻不能仅被当作一种语言工具,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工具的本质、意义和价值。隐喻思维蕴涵着某种超越外在现实世界的意向,体现了人类意识与精神活动的原始结构和方向。正如莱考夫(Lakoff)指出的,“隐喻无处不在,在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传统隐喻研究是局限于语言学和修辞学领域的,而当代研究则彻底打破此局限,将之置于心理学、哲学、符号学、文艺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视域内,并着重揭示其作为人类“心智的修辞方式”(figure of mind)在人类认知、思维及科学理论陈述与交流等领域潜在的巨大作用。

其次,隐喻与哲学和科学的内在关联被逐步揭示出来。自柏拉图至黑格尔,隐喻长期被理性主义传统、尤其是科学理性主义视为理性对立面,从而被排斥在哲学和科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在当代条件下,隐喻研究所应有的合法地位得以恢复。哲学方面,从古希腊柏拉图著名的洞穴隐喻,到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及其听觉隐喻,隐喻被承认直接参与了哲学的发展,以至于德里达认为整部形而上学的历史事实上无非是一部隐喻史;科学方面,隐喻同样是一种“合理的工具”。甚至可以说,近代科学即起源于对隐喻的论争,其结果是哥白尼的地球绕日运行的圆周运动隐喻(circle-motion metaphor)脱颖而出,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宇宙图景解释模式,对近代科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当代宇宙学中,则有所谓宇宙起源的“大爆炸隐喻”(Big Bang metaphor)。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交流的增强,科学家们正在逐渐取得共识,即认为隐喻对科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对科学

理论的构造和陈述,均有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再次,20世纪人类哲学运动中的语言学、解释学及修辞学“三大转向”,更加将隐喻研究的地位突显出来:隐喻首先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受到当代语言分析方法论家的关注。戴维森于1978年发表了著名论文《隐喻的含意》,塞尔也于1979年发表了长文《隐喻》。此后关于隐喻的语言分析继续升温,一大批有关专著和论文不断面世;隐喻与解释学核心问题的内在关联的研究也已被提上日程:“隐喻理解可作为对较长文本理解的指导”;著名的哲学解释学家保罗·利科为此发表了专著《隐喻的规则》,将隐喻研究从语词级提升到话语语义级的地位;尤其是在“修辞学转向”背景下的科学修辞学研究中,作为一种最重要修辞手段的隐喻,更成为研究的焦点。在科学修辞学中,隐喻成为“整个非文字设计集合的提喻法”,“构成了从技术语言到日常语言、从形式语言到自然语言之间的桥梁和理解的中介”,“在不同语境中,以不同形态表现出来的隐喻说明,深化了修辞学劝导及其战略构设的灵活性和生动性”。

最后,不仅几乎全部顶尖的英美语言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都对隐喻问题作出了深入的专门论述(如马克斯·布莱克、戴维森、塞尔、罗蒂以及库恩、奎因等),而且其他堪称大师级的欧陆哲学家(如卡西尔、伽达默尔、利科、德里达、巴特等)也都对隐喻有精湛的专题研究。可见,隐喻研究既是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下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欧陆人文主义传统下解释学理论及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关注热点。在这一共同的研究课题中,两大传统之间交流对话、互相借鉴及渗透的趋势正在得到自觉和不断的加强。这充分体现了当代哲学运动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融汇发展的整体趋向性。

隐喻的语境透视:语形、语义、语用的统一

如果说语词的字面意义表述对语境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那么隐喻语言对语境的依赖性要强得多。这种依赖性在于,为说出一个隐喻,说者必须对相关语境条件有深入把握并获致某种“洞察”;而为理解一个隐喻,听者也必须了解自己

与隐喻陈述者所共享的特殊语境特征。在语词的字面意义表述中,语词所指的基本特征由语词意义所引起的标准分类法所提供,而在隐喻表达中,听者必须通过语词的再概念化建构意义等级,并运用语境特征决定谈论所指的哪些方面或维度应考虑为相关的,即语境提示使听者决定隐喻陈述的哪一些意义特征应当接受,哪一些特征应当被放弃。可以说,离开特定的语境,就无法理解一个隐喻。从而,作为语形、语义和语用的集合和统一体的语境,构成了隐喻分析的切实可行的基底。

1. 语形是特定语境中隐喻的载体。

索绪尔给出了语言符号系统的两组二元对立模式:除能指与所指外,另一项重要的语言差别体系就是句段和语群的对立。句段(即邻接或组合)指句子里各语言元素之间的线性连缀关系,即一个词同其前后可能出现的词的关系,也称结构段关系;语群(即选择或代换)指句子的元素跟其他在句法上可与之互换的元素之间的关系,即句子中的一个词可以用另一个词置换而不会引起这个结构段不能接受,也称聚合体关系。语群代换包含了对近似性的察觉,这是隐喻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即产生一种相对于原来的句子来说其字面意义并不真实的描述。这是对隐喻语形本质的一种深入揭示。布拉格学派著名语言学家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将索绪尔的句段与语群二元模式应用于失语症的研究中,发现仅只具有语群代换能力而丧失了句段组合能力的失语症者,其所使用的语言几乎全部都是隐喻性的。这为索绪尔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隐喻最简单、最一般的句法形式是主谓结构的“S是P”,例如“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人是机器”等标准形式的隐喻陈述句,通过“是”构成S与P的同一关系,从而创造出隐喻的张力结构。一个完整的隐喻往往由“本体”S和“喻体”P两部分构成。有时,隐喻本体不在场,只有喻体出现在句子中,即S常常在语形上缺席。如果作更进一步的考察,我们会发现:事实上,一个隐喻句子中用作隐喻使用的往往只是其中的某些词,这些词可以称为隐喻的“焦点”;而其余的词是非隐喻地使用的,它们起某种“外架”的作用。例如,“主席

犁除(plough)众议使讨论继续”中,“犁除众议”是该隐喻句子的“焦点”,该句剩余部分则构成为一种“外架”结构。很显然,“外架”类似于隐喻句的某种“内部语境”。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所谓“S是P”的隐喻结构,不同于那种分析的主谓结构,即一个名词主词跟随意义相同的形容词或修饰词的结构。分析的主谓结构可以说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差别的同语反复(“S是S”),其中谓词包含在主词的涵义范围内,两者是同一的。这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对主词概念的任何其他解释,从而切断了其意义的联系和发展。隐喻结构则与此相反,它通过自身特殊的语形构架为意义提供了一种极大开放的可能性。当然,隐喻也可能由其他较为“隐蔽”的句法形式构成。例如,“某某在啃书”中的动词、“华盛顿是美国之父”中的述谓短语也构成隐喻。

我们认为,语形是隐喻赖以存在和体现的物质载体,任何隐喻陈述必然首先落在一定的语形基础上。但同时不能不强调的是,仅只运用语形分析还无力揭示出隐喻的本质特征。正如利科所指出的,隐喻研究并不是可以“通过将话语语义学还原为词汇实体的符号学来完成的”。尽管语句可以通过语群关系的自由代换构成一种结构性的隐喻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通过语义和语用两个层面获得进一步的说明。

2. 语义是特定语境中隐喻的本质。

既然语形只是特定语境中隐喻的载体,它本身并不能反映隐喻的本质,那么隐喻的本质究竟何在呢?我们认为,由语义互动引起的语义映射是特定语境中隐喻的本质所在。正是两个不同语境中的语义场在同一个句子内部的意义冲突、映射和协调创生出了隐喻意义。正如布莱克所指出的:“我们把一个句子称为隐喻的例句,是指有关它的意义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它的正字法、语言形式或语法形式”;“用众所周知的方法来区分的话,就应该把隐喻归入语义学的一个专有名词,而不属于造句法,或任何有关语言的形体方面的研究。”这样,隐喻的语境分析就不能不奠定在语义学的基础之上。首先,根据语义学的理论对隐喻的本体和喻体概念进行细致的语义分析并作出

精确界定,这是隐喻语义分析的一个前提和基本出发点。而一个完整的语义分析过程除这一初始步骤外,还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识别由喻体到本体的语义映射传递,以及最后确定该映射引起的语义变化。

(1) 语义比较、语义替换及语义偏离。比较论是隐喻语义学最为古老的一种传统理论,首先由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和《诗学》中提出。比较论认为,隐喻实际上是简写的、缩略的明喻,一个隐喻陈述即是将两个不同事物之间基础性的“类比”或“相似性”展示出来。大致来说,隐喻类型可分为四种,分别通过类与种概念、种与类概念、种与种概念的比较以及类比比较构成。隐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发现两个不同事物间的相似性并将其进行比较,一个隐喻陈述“S是P”应被分析为“有某种性质F和某种性质G,使得S之为F相似于P之为G”。语义替换论由公元一世纪罗马修辞学家昆提良(Quintilianus)提出。该理论的本质特征在于:认为隐喻实质上是使用隐喻词去替代表达同一意义的字面语词的一种修辞现象。如“约翰是只老狐狸”中,就是用“狐狸”代替了直接表达法“狡猾的人”从而造成隐喻。在这里,隐喻作者用隐喻词代替表达同一意义的另一个用作字面意义的语词,而读者则需要还原这种替换,以隐喻词的字面意义为线索去寻求作者原想表达的潜在意义。这个过程类似于破译密码或猜谜语。“作者所提供的,并不是他想说的那个意思 m ,而是由此产生的某种函数 $f(m)$;读者的任务是应用反函数 f^{-1} ,并由此得出 $f^{-1}(f(m))$,即其本来的意义 m 。”

比较论和替换论都仅仅把隐喻视为一种语词层次上的修辞手段,尽管它们在后世曾被广泛接受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当代却受到了严厉批评和反对。如布莱克即认为这两种理论“模糊”并且“内容空白”,其缺陷在于过于粗糙和表面化,不能对隐喻语义的内在机制作出深层阐释。此外,语义比较论与替换论事实上具有相同的理论实质,二者可用语义偏离论统一解释。例如,在“萨丽是一块冰”(塞尔的例句)这个隐喻句子中,比较论将其看作是“萨丽”与“冰”进行对比而构成隐喻,替换论将其看作是用“冰”替换了“一个严肃冷

酷的人”。无论是比较还是替换,都必须首先承认“冰”对“萨丽”的明显的语义偏离。语义偏离论认为,隐喻就其结构和形式而言,都是对正常语言规则的一种偏离,语义偏离是隐喻语义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偏离有意或无意地违反了正常的语义规则,具体说就是隐喻对语言的字面或普通用法的背离,这一背离引起语义变化,从而造成隐喻。著名解释学家利科进一步认为,偏离本身不造成隐喻,偏离的还原才引起隐喻。这样,一个隐喻就可视为说话者通过改变一词义以便偏离减弱的过程。此过程又包含两个相反而互补的方面:隐喻语词的使用与其字面意义相偏离,从而造成某种“不适当性”。在具体语境中对语义加以还原,从而使偏离减弱,“不适当性”消失,隐喻由此完成。这样,“隐喻意义就不再是字谜或语义冲突,而是字谜的解决,是新语义适当性的提出。”很明显,利科的这种观点强调并突出了替换论“反函数还原”的思想。

(2) 语义互动与语义映射。语义互动论是一种更为精致和有效的隐喻语义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隐喻命题包含两个基础性成分,即作为“主要主体”或“基本主体”的隐喻本体和作为“从属主体”的喻体。这两大主体往往是复杂的“事物的体系”,而不是单纯的“事物”。隐喻之所以形成,是由于对基本主体(即本体)应用了从属主体(即喻体)所特有的“联合蕴涵”的语义体系。这些蕴涵通常由有关从属主体的“常用语”组成,但在适当情况下,也可以由作者所特别造成的“背离习惯”的蕴涵组成。隐喻通过其所蕴涵的有关基本主体的命题(这些命题在正常情况下是应用于从属主体的)对基本主体的特征进行选择、强调、隐匿和再组织。由此引起与这隐喻词同一家族或同一系统中各个词的意义变化。如果说“比较论”或“替换论”观照下的隐喻语义本质包含了四个基本元素,即“隐喻词”(E)、“隐喻命题” $[F(E)]$ 、“隐喻意义” (m^1) 和“字面意义”(m),一个隐喻句可以解释为:某些焦点隐喻词E出现在语言框架F中,由此,F(E)形成一个隐喻命题,其中,E所具有的含义 $m^1(E)$ 是与某些同义词x的字面意义 $m(x)$ 相同的;那么,“互

动论”则认为隐喻语义的构成情况更加复杂一些,它还需要涉及到 F(E)的“主要主体”S(即该命题所“实际地”论及的那个事物),以及附属主体 P(即当字面地阅读 F(E)时所可能涉及到的那个事物),还有同 P相联系的有关蕴涵体系 I,包括由 I所得出的属性体系 A对 S所断定的。在 F语境中的 E的意义取决于使用语言过程中 I向 A的转化,即在正常情况下用于喻体 P的语言被用于本体 S。^⑪

我们认为,互动论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假设了隐喻是由两个不同概念系统之间的互动作用造成的,隐喻意义的基本单元不是词语或句子,而是一种“联合的蕴含”的体系,即所谓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语义场是一个有一定语义蕴涵的语义系统,它是一个双维结构,包括语义蕴涵的横向句法组合方面与纵向语义等级方面。如将“狗”这一概念视为一个语义场,在横向的句法层面上它只能与“白色的”、“温顺的”等表达相结合,而不能与诸如“液体的”、“第一的”等修饰语结合;其纵向的语义等级则蕴含不同种类的狗的概念。语义的互动作用必须通过两个不同语义场之间的特征映射(feature projection)而被理解。其中一个语义场(可称为源语义场,即“从属主体”的喻体语义场, the donor field)的语义特征映射到了另一语义场(可称为目标语义场,即“主要主体”的本体语义场, the target field)中。隐喻就是一种概念的两个语义场之间的互动。互动引起两个语义场的破碎和重组,隐喻就此生成。

语义场概念有助于我们确定隐喻与非隐喻的区别,其关节点就在于确定两个语义场是互相排斥的还是横断交叉的。若两语义场互相排斥,则其互动即引起隐喻意义。例如,在“血管是身体的灌溉渠”这个句子中,喻体“灌溉渠”与本体“血管”在语义上是互不相容的,即它们分属彼此相斥的语义场,这两个语义场的并列产生一种互动的“必要的张力”,相互影响和作用,从而创生了一个隐喻。“灌溉渠”语义场的蕴涵体系隐匿了与“血管”语义场不相关的语义特点,而强调了“滋润”和“营养”等相关语义方面,从而调整了我们对于血管的知识,即“灌溉渠”的语义蕴涵选择、过滤和改造了

“血管”的语义蕴涵。同时,在此隐喻句中,“灌溉渠”自身的语义蕴涵也不能不在“血管”的语义影响下发生某种细微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语义场概念类似于某种微观的意义语境,正是句子的这种“内部语境”的意义冲突构成了隐喻的本质。

在隐喻互动论中,描述和揭示两个语义场(本体和喻体语义场)之间的语义映射机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上文已经指出,隐喻效果的达成最终可以归结为从喻体语义场到本体语义场的一种语义映射过程。但这一过程相当复杂,要对之进行深入分析,有必要引入语义常项(semantic constant)和语义变项(semantic variable)这两个概念:对一给定的语言共同体中任一有意义的词,至少有一个一级属性(first-order property),此属性又至少包含一个次级范畴(second-order category)。如“冰”这个词,“固体”是其一级属性,此属性又内含次级范畴“气体/液体/固体”。语义常项指此一级属性,即事物概念的本质语义特征;变项指次级范畴,即事物概念本质语义特征内含的下属范畴变项。语义常变项概念的引入使由喻体语义场向本体语义场的语义映射过程及其机制清晰化了。一个隐喻语义映射过程大致包括四个子过程:本体语义场 S^1 引入了喻体语义场 S^2 的一个语义常项 C^2 ; 本体语义场 S^1 的一个语义常项 C^1 被喻体语义场 S^2 的一个语义常项 C^2 替换掉; 本体语义场 S^1 引入了喻体语义场 S^2 的一个语义变项 V^2 ; 本体语义场 S^1 的一个语义变项 V^1 被喻体语义场 S^2 的一个语义变项 V^2 替换掉。如果用 P 表示一次映射的子过程,用“ \rightarrow ”表示语义映射的方向,则可形式化表示为: 语义常项结合(引入)映射: $P(S^2 S^1 : S^1 C^2)$; 语义常项替换映射: $P[S^2 S^1 : (S^1 C^2) \& (S^1 \emptyset C^1)]$; 语义变项结合(引入)映射: $P(S^2 S^1 : S^1 V^2)$; 语义变项替换映射: $P[S^2 S^1 : (S^1 V^2) \& (S^1 \emptyset V^1)]$ 。一次隐喻映射过程可能是包含了所有这四种映射类型的一个系统过程。这样,语义常变项的结合或替换映射不仅勾画出了隐喻语义变化的具体层次和类型,还对揭示隐喻语义特征映射机制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起到了重要作用。^⑫

3. 语用是特定语境中隐喻的生成方式。

当代隐喻理论在隐喻语义学的基础上, 聚焦于语境中隐喻的使用和交流, 更加关注于句子的语用语境。这可以说是当代隐喻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走向。“隐喻语言不能单纯语义地来进行分析, 它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中, 语用地来加以参照。”^⑬这是因为, 隐喻是出于对特定语境条件的洞察而被建构起来的, 这种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实际使用的过程。因此, 任何隐喻只有通过具体的语用语境中的创造性建构使用才可生成, 其意义的实现实际上是一种语用的创造性的显现; 所以, 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成功的语言交流, 才可以说一个隐喻是“活的”隐喻 (live metaphor)。当代多数语言哲学家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仅仅依靠一种关于隐喻意义或隐喻真理的语义理论是无法全面揭示和展现隐喻的内在机制的。隐喻的语义映射本质必须而且只能在特定的语用语境中获得体现。

隐喻语用论由隐喻语义的静态分析转向隐喻生成的动态分析, 是对语义论的超越。其理论出发点在于, 认为以隐喻方式使用的语句具有一种“隐喻意义”的传统说法应予抛弃, 坚持并强调隐喻语句保有其严格的字面意义, 为理解一个隐喻, 必须充分理解其字面意义。“隐喻的含意无非就是其所涉及的语词的含意(按对此类语词的最严格的字面解释)。”^⑭隐喻之不同于通常话语之处是可以为后者增色, 但这并不等于它使用了超乎后者所依赖的手段之外的语义手段。无论隐喻是否依赖于一种新的或可能的扩展意义, 它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依赖于语词原有的字面意义。因此, 对一个隐喻的适当解释必须使语词的最初或原有的字面意义依然在其隐喻语境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样, 超越于语词字面意义之上的、似乎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隐喻意义”被拒斥掉了, 问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如何现实地、具体地理解所谓的“字面意义”。这样, 我们就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语用。正如戴维森所指出的, 隐喻“仅仅属于使用领域。它利用对语词、句子的想象性使用来达到”, “能够区分隐喻的不是意义, 而是使用。”^⑮

在语用论的观照下, 传统的隐喻语义理论出

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比较论试图把隐喻解释为指称之间的关系, 但是隐喻表述的产生和理解并不需要两个供比较的对象。当一个人说“萨丽是一块冰”时, 他无须对冰进行量化, 也不在字面上蕴涵($\exists x$) (x 是一块冰), 使其可以把萨丽与之进行比较。具有零外延(a null extension)的隐喻表达式也是如此, 如“萨丽是一条龙”并不在字面上蕴涵($\exists x$) (x 是一条龙); 同样, 否定式隐喻句更是对比较论的一种尖锐反驳, 如“萨丽不是一块冰”。因此, 比较理论首先在隐喻表达式的指称特征上发生了混乱, 即隐喻不一定必须是一个对于相似性的断言。首先, 对一个隐喻断言来说, 没有可用喻体 P 词项所特指的对象, 因此不可能预设一个比较对象的存在。其次, 即使导向隐喻意义的推导所根据的关于相似性的陈述为假, 隐喻断言仍可保持为真。因为真值条件不同, 所以隐喻陈述与相应的相似性陈述在意义上不能等值。相似性只能作为创生和理解隐喻的策略, 而不能作为隐喻意义的组成部分, 喻体词项 P 无须在字面上包括在对隐喻真值条件的陈述中。而语义互动论的致命缺陷则在于, 它试图把隐喻解释为涵义与指称相关的信念之间的关系, 但其基本假定(即认为所有表达式的隐喻使用都必须出现在包含表达式的字面使用的语句)就是错误的, 因为并非任何隐喻使用的表达式都被其他字面使用的表达式所“环绕”。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所谓混合隐喻(a mixed metaphor)的表达式, 如“坏消息冻成一块冰”(这里的“坏消息”、“冻”、“冰”均可作隐喻使用)。这个句子已完全超出了其字面使用的语境。尽管我们理解一个混合隐喻是相当复杂和困难的, 但混合隐喻本身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它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也是正当的。其次, 隐喻意义也并非相关语句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继续考察“萨丽是一块冰”这个例子: 主要主词(本体)“萨丽”与辅助主词(喻体)“冰”的意义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作用的问题, 因为“萨丽”仅仅是一个专名, 它并不象“冰”那样具有一个意义。这样, 互动论者所宣称的字面框架与隐喻焦点之间的互动关系显然是无中生有的。^⑯由此出发, 可以得出结论: 作为隐喻语义理论的两种主要形态的比较论和互动

论的解释力都不能令人满意;隐喻分析必须超越语义分析的层次,使用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即深入语用语境,采用语用分析的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隐喻视为一种类似于间接言语行为的东西。这是因为二者都是由于没有履行会话准则而在会话中被蕴涵着的。其次,隐喻也如同在一定语境中进行的语言游戏,游戏参加者必须了解和遵循有关的游戏规则。而这些游戏规则是由特定的相关语境制定的。从说者的角度来看,解释隐喻是如何工作的,就是解释说者如何在“分离”的意义上使用语词或句子。谈论一个语词、一个句子或一种表达的隐喻意义时,实际上谈论的是说者说出这种表达时实际上所含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与语词或句子的字面意义是相分离的。“隐喻意义总是说话者的表述意义”,即“说者通过说出语词、语句以及表达式所意味的东西”。^①语义内容仅仅决定与说者所设定的一系列假设相关的真值条件;如果一个语言交流事件实际上是成功的,则说者的假设必须同时被听者所理解。一个说者说了一个形式为“S是P”的句子,但他却隐喻地意指“S是R”。因为词项P的字面意义往往仅只代表说话者意义的一部分,它并不穷尽说者实际上表达出的全部意义。从听者的角度来看,要理解一个隐喻陈述,他必须意识到说者的言说可能是一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并因此根据某种相关的“策略或原则”(主要是语境原则)去寻求一种可选择的意义。即当说者的表述在字面上理解有缺陷时,听者就会对说者的言论去寻求一种非字面的隐喻的解释。当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他仍须根据上述策略或原则以估算出R的可能值(可能涵义);接下来还必须再次应用语境条件对R的可能涵义序列进行再限制,以决定最符合于说话者所说S的是R的哪些涵义层次。这实质上是一个指称确定的过程,其中语境原则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听话者必须使用他对于S、P和R的有关知识并根据具体的语境条件,具体地发现和把握说话者是如何说话的及其意欲达到何种效果,即必须掌握说话者是如何在一个特殊语境中使用其语言的。

那么,听者和说者可交流一个隐喻的充分必

要条件是什么呢?首先,必须有某种确定的语形及语义前提,在此基础上听者可以辨认出说者的表述不是在字面上被意指的。通常听者是根据以下事实:如果在字面上理解,表述有明显的缺陷;其次,必须有共同的把P词项(包括其意义、真值条件和可能的指谓)与一组可能的R的值联想起来的原理。阐明这些原理是解决隐喻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组“共同原理”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P事物根据定义是R,R是P的一个突出的限定性特征; P事物偶然地是R,R是P的一个突出或为人熟知的性质;对P事物来说R是假的,但P却常常被习惯地说成或被相信是R; P事物不是R,它既不象R也不被相信是R,但是由于“文化与自然的决定作用”或“关于我们情感的事实”,使P的说出在我们心中与R的性质相联系; P事物不象R事物,也不被相信为象R事物,然而P的状态与R的状态相象; P和R在意义上相同或相似,但P在其运用中因受某种限制而在字面上不适用于S;上述原理也适用于关系隐喻和其他句法形式的隐喻(如涉及动词和谓词形容词的隐喻);转喻和换喻的有关原理可作为某种补充。^②最后,根据“确定S的可能性质的R的可能值才可能是其实际值”这一原理,在了解了S词项(表达式意义及其指称对象性质)的基础上把R的可能值范围限定到其实际范围。

可见,无论是隐喻的说者还是听者,他们对所谓“共同策略和原则”的应用与选取都必须依赖于特定的语境条件。换言之,正是语用语境构成了隐喻创造、理解和交流的“触媒”与“规范”。舍此,说者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有深刻洞察力的隐喻(而且这种洞察往往是对相关语境条件的洞察),听者也会无法理解此隐喻的含义。

结束语:朝向语境论的隐喻研究走势

本质地讲,隐喻是以一定语形为载体、在特殊的语用语境中生成的一种语义映射。正是特定语境中语形、语义、语用的统一,决定了相关隐喻的生成及其本质意义。一个隐喻的有意义的实现是通过相关语境的选择性和规定性所保证的,包含了“隐喻术语的指称对象、谓词外延和函项的功能

选择”,并且生动地展示出了“语词的浅层语境与深层语境、形式语境与意义语境之间的跳跃与变换”。^⑭一种有效的隐喻分析不能脱离特定语境的基底而进行。这样,朝向一种隐喻的语境论就成为当代隐喻研究有前途的趋向。一方面,一个新隐喻的创造不仅是特定语境的产物,也使原来的语境获得了某种新的涵义,从而体现出一种“再语境化”的功能;另一方面,随着语境的发展和变化,原来的新隐喻也会逐渐失去其新义,而转化为语词的字面意义和普通意义被收入词典,成为一个“死的”隐喻(dead metaphor)。因此,对于隐喻的语形、语义、语用的分析考察,也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认识相关语境的特征、更清晰地描画语境的流变发展轨迹,从而更科学地把握隐喻的本质。

Simon Blackburn,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40.

Lakoff &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1.

保罗·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冯俊等译,河北人

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6 页。

⑬郭贵春:《科学修辞学的本质特征》,《哲学研究》2000 年第 2 期。

⑭M·布莱克:《隐喻》,《当代美国哲学论著选译(第三集)》,涂纪亮编,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84~85、85、92、102~103、105 页。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3、356~357 页。

⑮Daniel Rothbart, Explaining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etaphors, Models and Meanings, Lewiston/Queenston/Lampet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7, pp. 29~36.

⑯⑰Donald Davison, What Metaphors Mea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dited by A·P·Martini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38, p. 446.

⑱⑲John Searle, Metaphor,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dited by A·P·Martini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21~424, p. 417, pp. 431~433.

⑳郭贵春:《科学实在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6 页。

作者简介:郭贵春,1952 年生,山西大学校长、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军,1976 年生,山西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涛)

《南史》考疑(五)

丁福林

《卷二 宋本纪中》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巳,宴于丹徒宫,大赦。

(中华书局 1975 年 6 月版点校本,第 51 页)

《校勘记》:按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卯朔,无丁巳,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疑“三月”为“四月”之讹。

按:《校勘记》指实“三月丁巳”之讹,甚是。然而其疑“三月”为“四月”之讹,似尚可商榷。盖文帝是时宴于丹徒宫并大赦事乃因是年二月幸丹徒而起,《宋书·文帝纪》云是年“二月己亥,车驾陆道幸丹徒,谒京陵”,本卷上文亦云是年“二月己亥,幸丹徒,谒京陵”,所载皆同。考是年二月丁酉朔,己亥为月之初三日,丁巳为月之二十一日。本卷此条下又出“癸亥”,若在二月,则为二十八日。京口与京都建康相距甚近,仅一日之行程,则文帝至京口后寓于丹徒宫并大赦等事,亦可能在二月丁巳,而未必即在二个多月之后的四月丁巳。如此,则此“三月”,或又恐乃衍文也。

然究竟为二月抑或四月事,因未得明证,尚未可定耳。

《卷三 宋本纪下》

贼党杜黑蠡、丁文豪分军向朱雀航,刘劭拒贼,败绩,死之。(第 86 页)

按:“杜黑蠡”,《宋书·后废帝纪》、《南齐书·高帝纪》、本书之《齐本纪上》、《宋宗室及诸王传下》皆同,《宋书·文五王·桂阳王休范传》、《建康实录》卷 14 作“杜墨蠡”,《通鉴》卷 133 作“杜黑驪”,《魏书·岛夷刘裕传》作“杜墨驪”。洪颐煊《诸史考异·魏书下》云:“《刘裕传》,休范将杜墨驪又攻新亭东厢,昱将显达率所领至杜姥宅破墨驪军。颐煊案《宋书·桂阳王休范传》、《南齐书·高帝纪》俱作:‘杜墨蠡’。朱季海《南齐书校议》云:‘沈、萧以黑驪名鄙,故以‘黑蠡’字代之耳。裴、魏从质,为得其实。《通鉴》从裴,是也。’又云:‘墨、黑义同,太氏河、朔谓之墨,江南谓之黑。故沈、萧云杜黑蠡,《魏书》作杜墨驪。’”